

汉碑隶书

文字整理与研究

张翼飞 著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汉碑隶书文字整理与研究

张翼飞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碑隶书文字整理与研究 / 张翼飞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48-6134-5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隶书-碑帖-研究-中
国-汉代 IV. ①J292.1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5506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南省中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8.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汉碑隶书字形整理	15
第一节 字形整理的单位	15
一、字样	16
二、字位	16
三、字种	17
第二节 字形整理的基本原则	18
一、字种层面字形整理的基本原则	18
二、字位层面字形整理的基本原则	22
三、字样层面字形整理的基本原则	23
第三节 字样间的关系类型	23
一、同形字样的基本面貌	23
二、同形字分析	25
第四节 汉碑隶书文字表	27
第二章 汉碑隶书中的异写字	30
第一节 汉碑隶书异写字概况	31
一、字位主形与变体分布	31
二、影响变体数量的主要因素	35
第二节 异写字的类型	37
一、构件异写字	38
二、笔画异写字	43
第三节 构件的形变规律	46

绪 论

一、研究目的

汉代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汉代立碑之风的盛行，汉字的载体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碑刻作为一种文字载体走向成熟，为汉字提供了更广阔的使用场合，此时期的汉碑多用隶书写就，“凡一种字体在郑重的用途中，如鼎铭、碑版之类上出现，即是说明这种字体在这时已被认为合法。”^① 汉碑隶书代表了当时社会通用文字的主流。另一方面，汉代处于古今文字交界阶段的中后期，以汉碑隶书为代表的汉隶走向成熟，完成了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转变。该时期的汉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字体上来说，从战国晚期开始萌芽于小篆的古隶演变为了成熟的汉隶；从外部特征上来说，实现了从小篆长圆形格局到隶书扁方形格局的转变；从书写单位上来说，实现了从古文字线条到今文字笔画的转变；从汉字构形上来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异写字和异构字。因此，要了解汉代通用文字的书写状况和变异状况，离不开对汉碑隶书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本论文拟实现如下目标：

首先，利用计算机从汉碑拓片中提取字形图片，并按照字种、字位、字样三个不同层次的单位进行字形整理，制作出《汉碑隶书文字表》。

其次，在字表的基础上，描写出汉碑隶书的书写状况和构形状况。着重从书写的角度对汉碑字形的变异状况进行分析，总结出汉碑字形变异的规律，进一步探讨字形变异的原因。

再次、结合与汉碑隶书有关的各项文化背景，对当时汉字在发展和使用中

^①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38页。

的一些现象进行阐释。

本选题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汉碑隶书上接小篆，下启楷书，在字形演变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将汉碑文字整理成《汉碑隶书文字表》，具有非常高的字料价值。“保存古代汉字的文物和文化价值，离不开对历代汉字原始形体的保护。”^①丰富的汉碑原始字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从整理、保护的角度讲，对其进行收集、类聚和整理，对继承和弘扬汉字文化，保护汉字遗产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隶书是楷书的源头，楷书中的很多字形只有追溯到隶变，从汉代碑刻和简牍中才能找到根源。因此，汉碑字形变异的研究在楷书的规范与整理、字书的研究与编撰、古籍整理和汉代碑刻文献整理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再次，从汉代社会实际用字状况出发，客观、全面地描写汉碑文字的变异状况，总结汉碑字形在笔画、构件和整字上的变异规律，可以进一步丰富汉字构形学理论。

二、研究材料

“碑是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字资料而制作的立石或刻石的总称，也特指地面上具有特定形制的长方形刻石。”^②王立军的这一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碑”做出了界定，相对应地，碑刻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上的碑刻是指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献资料在石质材料上所刻的内容；狭义上的碑刻特指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献资料在具有特定形制的长方形石质材料上所刻的内容。^③本文所使用的是广义上的碑刻。从历史上来看，东汉以前不用“碑”来称谓刻有文字的石头，而称之为“刻石”“碣”等，但自宋代金石学兴

① 李国英、周晓文，《字料库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48-53页。

② 王立军，《中国古代碑刻文献综论》，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3页。

③ 同上。

起以来,通常将凡是刻有文字的石头都叫作“碑”,“石刻”和“碑刻”的所指实际上是相同的。本文采用“碑刻”一词,主要是沿袭宋代以来的习惯称谓。

本文中所说的碑刻文字是指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献资料,而在石质材料上所刻的文字。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一,所用的材质必须为石质,这一要素可将碑刻文字与砖瓦铭文区别开;二,所刻内容必须是文字,这一要素可将碑刻文字与石质画像区别开;三,刻写文字的目的必须是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献资料,这一要素可以将碑刻文字与石质的玺印文字区别开。

本文的研究材料为从西汉初到东汉末(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这一时期内的碑刻隶书文字。材料的选用以《汉碑全集》和《汉石经集存》中所收录的汉代碑刻拓本或照片为主体,酌情补入或选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汉代石刻集成》《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卷》《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战国秦汉卷》以及各类期刊上搜集而来的更为清晰的拓片,并进行进一步的甄选。对材料甄选的总原则是“全而不伪”,具体为:一,原石或原拓尚存者均选用,碑阴、碑额、碑侧上的隶书文字(均不包括后人增刻的文字)一律选用。二,伪刻不录。伪刻对断代文字学研究没有价值,我们在材料来源中所列的诸家多已经过比较严格的筛选,收入伪刻的情况极少。对于个别伪刻,我们主要依据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胡海帆《秦汉刻石文字要目》、华人德《两汉刻石文字要目》等论著进行剔除,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战国秦汉卷》中的营陵置社碑、大风歌碑等。三、只要尚有可辨识之字的碑刻一律选入,但漫漶不清、残泐过半的字形不进行字样的提取。

经过甄选去重后,我们共收集到292种汉碑(取自《汉石经集存》中的《熹平石经》计为了1种)。从立碑年代看,无纪年者98种;有明确纪年者194种,其中西汉碑14种,新莽碑2种,东汉碑178种。从碑文的字体看,以篆书刻写者30种,以隶书刻写者262种。这262种以隶书刻写的汉碑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因西汉碑刻传世较少,且多数为篆书,隶书只有4种,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研究材料统称为“汉碑隶书”,实际上本文整理和研究的材料主体是东汉碑刻隶书。

三、理论依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以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汉字简化与优化理论

和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并沿用汉字构形学的相关术语。

1. 汉字构形学理论：汉字具有社会性，在构形上以系统的形式存在。每一个个体字符在这一系统中都有各自的位置，与其他字符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汉字具有理据性，个体字符的理据体现在整体系统之中。汉字具有多重属性，其属性有构形属性、书写属性、字体属性等。构形属性包括各级构件及其功能、构形模式、层级数；书写属性包括各笔笔形、笔顺、笔画数量、笔画交接方式等；字体属性包括行笔、结字和笔意。^① 汉字的发展是无界有阶的，是渐变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汉字的演变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为系统变化的过程。

2. 汉字字体学理论：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中，阐明了字体的内涵：“字体是指文字的形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② 目前学界一般将启先生所说的第一类称作“字体”，第二类称作“书体”，字体的研究应归入文字学领域，书体的研究应归入书法学领域。考察字体的不同主要看构造和风格两个方面：“（一）组织构造的变化，包括：（1）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也可以说各单体或偏旁的不同；（2）各局部的安排以及笔划数量的不同。（二）书写风格的变化，包括：（1）笔划转折轨迹的不同，即圆转或方折等差别；（2）点划姿态的不同；（3）表现字迹的条件不同，即用途、工具、方法等等的差别；（4）书写习惯的不同。”^③ 王宁先生认为，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第一，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第二，字体风格多种多样，形成的原因有时代、用途、工具、方法、写者、地区六个方面；第三，历史字体存在名实不对应的现象，这是由于字体分类的多角度、

① 构形属性和书写属性参考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66页。风格属性参考王宁《从释读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论启功先生文字学的特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

②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1页。

③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4-5页。

多标准造成的；第四，字体风格模糊朦胧，但特征是可以描写的。”^①

3. 汉字的简化与优化理论：王宁先生认为，汉字的社会功能是由释读与书写合起来实现的，个体字符在易写和易识的相互矛盾中，不断调节造型，使其繁简适度，达到优化标准；在新词新义大量增加，字符不得不随之增加的情况下，要不断地规整基础构件与构字方式，使文字的总系统不断地完善和简化。优化的字形要符合以下原则：（1）有利于形成和保持严密的文字系统；（2）尽量保持和维护汉字的表意示源功能；（3）最大限度地减少笔画；（4）字符之间有足够的区别度；（5）尽可能顾及字符的社会流通过度。而在汉字字形和字体演变过程中表现出的重复、驳杂、混乱等种种现象，实际上都与汉字的动态书写密切关联。因此，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不仅要从静态的角度研究已经写好的字，还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字是怎么写出来的。^②

四、研究综述

（一）汉碑文献的整理与著录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狩四方，在琅琊、泰山、会稽等地立石刻文，《史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些文字，因此，后世多以《史记》为记录石刻文字之滥觞。《汉书·艺文志》有《奏事》二十篇，是秦代大臣的奏事和刻石铭文。北魏酈道元根据实地调查，在《水经注》中记载了秦汉以下刻石 270 多种^③，其中汉

① 王宁，《从释读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论启功先生文字学的特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王宁先生曾在《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载《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中归纳过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但和以往相比，此文有较大的改动，因此在引用时以此文为准。

② 本段参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载《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载《语文建设》1992年第1期；《从释读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论启功先生文字学的特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

③ 施蛰存，《水经注碑录》，施蛰存《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2页。

碑 114 种。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各种专门研究金石文献的著作数以千计。在此,我们仅择涉及汉代碑刻文献者数种,作大致的介绍。

编目类著作:编目主要是辑录碑刻目录并对其情况作简单介绍,能让我们一览金石文献的概貌。编目类的著作可分为两类:断代类目录和通代类目录。汉碑断代目录始于清代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该书卷一以年表的形式,分列纪年、时事、金石文目三栏,共收汉碑 78 种。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邢澍合著的《寰宇访碑录》收碑刻目录 7853 种,其中汉碑目录 196 种,每条尽量注明撰人、书家书体、立碑时间与所在地,是迄今搜求最广的金石目录。

题跋考辨类著作:考辨的内容和形式都较为随意,从内容上说,可评论史实、可考释文字词语,也介绍碑的形制、源流,辨别拓本的真伪优劣,评判书法的高下等;从形式上说,可为专著,也可为札记。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文献的专书,也为后人的题跋类著作奠定了基石。该书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 多篇,内容多偏重于史事评论。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30 卷,该书仿《集古录》之体例,但题跋已依年代排序,收 502 种题跋,包括汉碑题跋 223 种。清代考据之风盛行,涌现了大量题跋类著作,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并续》《又续》《三续》,王念孙《汉碑拾遗》,俞樾《读汉碑》《读书余录·汉碑四十一条》等,在文字的释读、音韵、训诂的考辨方面多有真知灼见。晚清张延奂的《汉碑古字通训》吸收了宋代以来诸家在碑文考释方面的成果,是清代以前汉碑文字考释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对 131 种汉碑铭文中的“古字”进行了逐条考证,资料翔实。^①方若的《校碑随笔》、今人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杨震方《碑帖叙录》、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施安昌的《碑刻分类与鉴定》等著作在考辨拓本真伪方面成就卓然。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则偏重于评判碑帖书法的高下。^②

录文类著作:录文指按照一定的方式将碑刻文献记录下来。南宋洪适撰

① 综观各条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张氏已经注意到其所谓的“古字”情况复杂,但囿于时代原因,他在考证中多以“某与某古通”“古以某为某”等进行笼统的概括,并依然将汉碑铭文中出现的异体字、通假字、同源通用字、讹形字等各种复杂的文字现象统统视为“古字”,而未能做出更为科学的区分。

② 下文不专列辨伪类,姑将部分今人的著作附于此。

《隶释》《隶续》二书，为现存最早的主要以辑录碑文为目的的著作，共收录汉碑 258 种，每一碑皆先摹录碑文，次介绍碑刻信息，有关史事者又为之考辨，再次沟通文字。清代王昶《金石萃编》160 卷，其中有汉代碑刻 79 种。

上述仅是为了表述方便，依各著作的主要特点所作的粗略分类，实际上有些著作不专属于某一类，如《隶释》《金石萃编》实兼跨三类，《两汉金石记》也兼具录文和考辨的功能。

随着历代出土文献的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原有的“金石学”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出土文献研究，而逐渐分割成为若干个更细密的领域，以下主要介绍 20 世纪以来学者对两汉碑刻文献的整理与著录。

1. 辑目

今人在辑目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胡海帆的《秦汉刻石文字要目》，共收录汉代石刻 403 种^①，收录的石刻一般以有原石拓或原石本传世为限，若原石亡佚，原石拓本也不见传，则以摹石或摹石拓本代之，文献虽有记载，但原石、摹石及其拓本不见传者不收录。另一种是华人德的《两汉刻石文字要目》，该《要目》以胡氏的《要目》为蓝本，仅保留有原石或原石拓本传世的汉代石刻，另又增补 17 种而成，共收石刻 414 种。

2. 题跋辑录

前人的碑刻题跋考辨在补史之阙、古籍整理、语言文字研究、书法研习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民国以来，对碑刻史料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容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辑成《秦汉石刻题跋辑录》（2009 年出版）一书，该书收宋至民国间各类金石书籍和文集中有关秦汉石刻的 2000 多条题跋，分编于 300 多种汉碑之下，是我们查考汉代碑刻文字相关考证成果的必备工具书。

3. 碑文释读和拓片汇编

保存至今的汉代碑刻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泐，因此，在两汉碑刻文献的整理中，释字、断句和释义是最基础也相对较难的问题。清代以前的学者在释字和释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他们的著作基本上不断句，现代人阅读起来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今人在碑文释读方面的成果更便于我们吸

^①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7—8 卷《秦汉刻石》部分，分卷主编何应辉，荣宝斋，1993 年，558 页。尚有秦代石刻 8 种，据胡海帆在《秦汉石刻题跋辑录》中称，《秦汉刻石文字要目》在第二版修订时，已增补至秦汉刻石 550 种，但本人尚未查得。

收和借鉴，目前专门释读碑文的著作主要有高文的《汉碑集释》和李檣《秦汉刻石选译》，此外，不少拓本汇编类著作也有碑文释读。

目前，拓本汇编类著作主要有：山东省文物总店编《山东秦汉碑刻》，1984年出版，收录两汉碑刻拓片37种；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战国秦汉卷》（以下简称《汇编》），1989年出版，收录两汉碑刻拓片191种；刘正成主编、何应辉分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之《秦汉卷》（以下简称《书法全集》），1993年出版，收录两汉碑刻拓片193种；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所编的《汉代石刻集成》（以下简称《集成》），1994年出版，收录两汉碑刻拓片176种，画像石题记及黄肠石多不录；徐玉立主编的《汉碑全集》，（以下简称《全集》）2006年出版，共收两汉碑刻拓片285种，合计360件；毛远明校注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以下简称《校注》），2009年出版，共收录了两汉碑刻拓片178种。其他专供书法临习的单行本如《曹全碑》之类的难以计数，不赘述。现对本文重点参考的几种重要著作评介如下：

《汇编》的主要体例为：一、仅收原石拓本，无原石拓本者以翻刻代之，伪刻不录。二、各拓本依年代先后为序。三、附有简单说明文字，介绍碑刻的出土时地、字体、拓本尺寸、拓本藏家等信息。《汇编》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出版石刻拓本，在石刻文献整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体例也被后出者继承。但该书的说明文字偶有误处，时贤已有指正者。

《全集》是迄今为止搜罗最富的汉代碑刻拓本汇编，不少碑刻拓本为首次公布。每碑有简要说明、图版和释文，并附可参考的文献。就我们目力所及，该书释文偶有误处。

《校注》在体例上又有突破，所有释文均加标点，并有比较详细的校勘和扼要的注释，对前人的释文错误多有纠正，尽量保证了释文的可靠性。

也有学者专就特定内容的汉碑文献进行整理汇编，如马衡的《汉石经集存》和孙伯涛的《两汉刻石碑额》。《汉石经集存》于1958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印行^①，收汉代熹平石经拓片520片，释文总计8000多字。《两汉刻石碑额》2005年出版，收录西汉刻石14种，东汉篆书碑额24种，东汉隶书碑额20种。

尚有部分网站公开发表了一些碑刻拓片，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网站，

① 本选题所据为另一版本，马衡，《汉石经集存》，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

公布了该所收藏的历代碑刻拓本资料^①，其中汉碑 99 种，共 117 件。

以上所述之资料，各有特点，能互相补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靠又便利的基础资料。

（二）汉碑隶书的整理与研究

1. 汉碑隶书的整理

出于一定的文字学目的对汉碑隶书进行过整理的字书有很多，兹择数种介绍如下，以期看到前人在字形整理方法上的发展。

宋代刘球《隶韵》，淳熙二年（1175 年）成书表进，宋以后该书长期埋没，直至清中期始出。全书十卷，从 261 种^②汉魏碑刻（实际上包含少量金属器物铭文）中搜集文字。该书将记词功能相同的异体字样类聚为一组，组前列楷体正字为字头统领，字头计 3275 个^③，皆依韵排列（所依之韵书不明，前人亦无说）。楷体字头下，列摹写的异体字样，并分别注明出处，字样间的排列随得随载，基本无序。《隶韵》上承洪氏诸书，下启《汉隶字源》，是现存最早的专门辑录汉代碑刻文字的著作，为后代的“碑别字”搜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该书摹写字形时有失真，翁方纲曾作《隶韵考证》两卷详辩之。

宋代娄机《汉隶字源》六卷，在《隶韵》基础上增益而成，清代翁方纲说：“娄氏《字源》所采汉隶，实皆沿此，而稍附益之。”^④《汉隶字源》中的《碑目》收录汉碑 309 种，依“随得随载”之例编号排列。字编部分五卷，依《礼部韵略》编次。与《隶韵》相比，该书有以下特点：一、继承了《隶韵》类聚字样和设置楷书字头的做法，又有所发展，具体为：1. 对字样的收集和编排有统一的原则。每碑内一字数出者，只收首出字样。各字样间依碑目编号排列，注出所出碑名之编号。2. 将通假字附在每组之后，不列编号，兼具本字身份的

①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资源网站链接：<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

② 引自《续修四库全书》第 236 册宋刘球《隶韵》，翁方纲《碑目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727 页。

③ 数据引自宋刘球《隶韵》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9 年。

④ 《续修四库全书》第 236 册宋刘球《隶韵》，翁方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461 页。

通假字在用为本字时，以独立字头处理。二、通假字和形变较剧的异体字下，各加以考证。《汉隶字源》是清中期以前学者研究汉隶时最重要参考资料之一，《碑目》中所收的碑刻，到清代仅存十分之一左右^①，该书在保存汉代碑刻文字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再者，姜氏所作的考证或辨析字形，或沟通字用，“于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磔为书家模范而已也”^②。《汉隶字源》可与刘氏书参互证明，足补其缺，所谓《隶韵》一出，则《汉隶字源》“束阁不观可矣”^③的评价实在有失公允。但《汉隶字源》还很不科学：每碑选首出字的选字方式，容易漏掉有重要价值的字样，或重复选用没有研究价值的字样；对异体字“随得随载”式的排列方式，也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清代顾蔼吉的《隶辨》收汉魏碑刻 317 种，在《汉隶字源》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全书共八卷，前五卷为字形汇撰，依《广韵》韵次编排^④，剔除了《汉隶字源》中的部分重复字样，又增补了宋到清之间新出汉魏碑刻上的文字，吸收了洪、姜两家的考释成果，并有所扩展，每个字形之下均出碑名和碑文例句，引证和按语增多。卷六为《偏旁五百四十部》，依《说文》五百四十部，通过字例分析了各部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情况。《隶辨》的字样整理体例在《汉隶字源》的基础上有了质的提高。顾氏已经认识到了异构字与异写字的不同，并以此为指导，对所收字形作过精心的整理与安排，申说如下：一、排列异体字时分了两个层面——异构层面和异写层面，各异构字之间是并列关系，并分别统领其一定数量的异写字。二、在异写字层面上，对重复字样进行归纳，并尽量根据义符或声符的变异程度排列异写字，力图展现义符或声符的演变过程。（以上两条的前提条件是每组有相当数量的字样，并且字样间会出现各种关系。）《隶辨》对字样的整理更具科学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在篆隶变迁之际字形和部首的演变过程，具有相当高的文字学价值。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① 据清纪昀等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 册《总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860 页。

② 清纪昀等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 册《总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846 页。

③ 《续修四库全书》第 236 册宋刘球《隶韵》，翁方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461 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为依《礼部韵略》编排，韩国学者何永三考为依《广韵》编排，何永三之论文未见，此参考宫淑娟《隶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08 硕士学位论文，9 页。

兹举如下：一、所收字形有因避讳而改原碑字形的地方，如“玄”和从“玄”之字。二、结构安排不合理，以至于在客观上造成混乱。同组内处于不同层次的字样之间、各组字样之间均没有明确的标志，又是依韵编排，看起来像是字样的杂乱堆积，客观上很难辨识同一组字的边界。这些不足致使后人难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

《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清邢澍撰，约成书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后，该书对异写字的收录大幅度减少，已经开始将研究的重心偏向于异构字。其收字范围为唐宋以前的金石资料，首开辑录篆、隶、楷各体碑版别构字之先河。邢氏“善加利用了乾嘉汉学复兴时期迅速累积的金石材料，以及当时金石名家的案断”^①，引证丰富而不穿凿，汉碑以下多有发明。但该书在编字体例上未超出《隶辨》的范围，审校不精，今人时建国为之作《校释》，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清翟云升撰《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各十五卷^②，三者体例相同，最终成书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该书收录两汉魏晋出土文献资料227种，其中汉代出土资料149种^③（包含少量的金属器物刻铭），整理出3113个字位^④，是清朝以前研究整理汉代碑刻文字的集大成之作。有以下特色：一、继承了《说文》的部首编排法。前所述刘、娄、顾、邢各家之书均依韵编排，翟氏在自序中说：“愚以为保氏六书，肇于偏旁，《说文》五百四十部，分部别居，为文字根苑。由篆变隶，去繁趣约，非偏旁无以观其变，非分部别居，无以观其变之变，《隶篇》所为作也。”^⑤二、撰《偏旁》和《变隶通例》，两者经纬互参。《偏旁》之设，仿照《隶篇》之《偏旁五百四十部》，列篆体部首同而隶体部首异者，以考察部首从篆到隶的演变。《变隶通例》实为首创，列隶体构件同而篆体构件异者，以考察哪些构件演变成了同一个隶体构件，各隶体构件依形系联。三、极为重视材料的可靠性。南宋以来，《隶韵》潜藏，《汉隶字源》因屡经传

① 清邢澍著，时建国校释，《金石文字辨异校释》，时建国《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2页。

② 清翟云升，《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北京出版社据翟云升“五经岁遍斋”初刊本全帙影印，于1997年出版，出版时更名为《隶书大字典》。为表述方便，下文统称之《隶篇》。

③ 此处数据依全书《金石目》统计。

④ 引自该书出版说明。

⑤ 《隶篇》自序，7页。

刻而字形尽失，顾氏、邢氏辗转沿录，未能据拓本一一对照厘正，舛讹日积。有感于此，翟氏对材料的要求极为严格，所据材料或为拓本，或为可信之摹本，所收字形均为作者亲手以双钩法钩摹，毫芒必谨，“于诸著录家无所贩鬻”^①。核查原碑拓本的结果说明，该书所收的文字字形较可靠。四、异写字字形的选取标准更为严格，“形非殊异者，不更录入”^②。综上所述，翟氏《隶篇》博采众长，体例严谨，字形较可靠，《偏旁》和《变隶通例》部分对研究从篆到隶的演变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但该书并非没有缺憾，略举如下：一、囿于“分部别居”体例的限制，将义符不同的异构字散见于各部，不便检寻。二、从《变隶通例》可以看出，翟氏虽已初具构件的思想，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他对构件的拆分和归纳还不科学，不利于从其研究结果中总结规律。

以上种种字书可从各个角度来看：从字样形体接近本真的程度上来看，《隶篇》为最，其他较次。从字样类聚方式上来看，《汉隶字源》《隶辨》《金石文字辨异》均将字用问题与字形问题混在了一起，而《隶韵》《隶篇》均将通假情况排除。从对字组内的编排次序来看，《隶辨》和《隶篇》较为合理，其他诸书的编辑方法多为随见随录，没有从变化规律上分门别类地予以归纳，不易通观异体字的变化状况。从字组之间的编排上来看，各家难分优劣。从字书的功能上来看，《汉隶字源》《隶辨》《金石文字辨异》《隶篇》诸书均兼字形汇集和考释两种功能。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是对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资料的一次较系统的整理，该表一共收录了字头 5753 个，秦汉魏晋篆隶字形 21 700 多个，所选字形基本上是从原拓本或原件照片中摹取出来的，基本上保证字形的可信性。字表依《说文》部次为序，字头下之字形按文字发展的历史层次分三栏：秦、西汉、东汉魏晋，便于了解文字字形的演变。表后附字形所在之文句，并将异体字、通假字、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文用括号注出，为语言文字研究和古籍整理提供了参考。但该书对两汉文字字形的选用上，偏重简帛而轻于碑刻，对两汉碑刻文字字形的收集还很不完备。

通过以上所述，大抵可以看出有宋以来碑刻文字整理体例的沿革。

出于书法学目的的字典数量也有很多，主要有：汪仁寿《金石大字典》（天

① 《隶篇》自序，7 页。

② 《隶篇续》《再续》序，1019 页。

津古籍书店, 1982 年)、范初庵《中国隶书大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1 年)、沈道荣《隶书辨异字典》(文物出版社, 2003 年)、沈鹏等主编《中国隶书大字典》(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陈振濂主编《中国隶书大字典》(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等, 该类字形的选取主要以书法高下为标准, 对我们的研究参考价值不大, 此不赘述。

2. 汉碑隶书的研究

近年关于碑刻文字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以其他时代碑刻文字为对象的研究主要有: 易敏老师的《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5) 齐元涛老师的《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2007)、陆明君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2007)、郭瑞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传承与变异》(2008) 等。王立军的《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一书, 虽不是对碑刻文字的研究, 但其中对汉字形体变化的原因和规律的探讨和阐释, 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对汉碑隶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宋代金石学兴起之时, 但前人的研究偏重于文字释读与考辨, 没有对字形进行系统的研究。而在以两汉碑刻文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 从书法学角度出发对单种或几种名碑的书法风格进行研究的占大多数, 但从文字学角度对汉碑隶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论著还不够多。

在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 陈淑梅较早地对东汉碑刻隶书进行了全面研究^①, 其《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一书选取东汉的 68 通隶书碑刻约两万字的资料进行了定时、定量、定质的研究, 对所选材料进行了穷尽性的测查, 并将它们整理成字表, 从构形属性上加以描写和分析, 从宏观上描写出了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的总体面貌, 揭示了汉隶的总体特点及演变规律。陈氏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但该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描写东汉碑隶的构形系统, 而未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字形的变异上;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该论文字表中的字形均是摹写的, 与汉碑文字的原始面貌还有一定的差距; 近年集中公布了一批新的汉碑文献, 补充了新的研究资料, 但由于成书时代问题, 该书未能收入这些资料。

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单篇论文探讨汉碑中构形理据和字形演变的关系, 如黄漪(1994) 认为汉字对表音性的坚持对汉隶中的形声字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

^① 陈淑梅, 《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